
中国的福音神学：第四个“自”——自建神学

叶艾伦 博士 (Dr. Allen Yeh,) 拜欧拉大学

全球神学通常由非洲，拉丁美洲及亚洲的神学构成。在过去五十年左右，由于基督教的重心向第二、第三世界转移，这已成为我们关注的最重要地方。不过，传福音和宣教经常发生在神学革新之前，所以，过去的十年左右中，真正的非西方神学才得到广泛关注。1841年至1873年，英国海外传道会总干事亨利·范恩，提出了“三自教会”的用语¹，其包括：自养、自治、自传。许多人错误都认为，三自教会只是指中国官方教会（即，所谓的“三自基督教协会”，或者1951年开始的“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不过，“三自”这个用语的起源远远早于中国的使用。然而，宣教士希伯特(Paul Hiebert)提出需要增加第四个“自”，就是“自建神学”（本色神学）²。主流世界的教会可能都是“三自”，并仍然模仿着相应的西方教会。只有他们开始“自建神学”时，他们才真正进入他们自身的（福音神学）。自建神学意味着他们需要开始着写他们自己的敬拜诗歌、他们自己的信条、他们自己的神学。自建神学是“长肉的”，而不是“喝奶”；自建神学是第二、第三世界的教会，后期成长和成熟的重要部分。

我们生活在一个令人激动的时代，如今也发生着令人激动的事。除了信条之外，现在还有一个主要制作圣经注释的运动。第二、第三世界（TTW）的学者神学家，不在某些牧区服侍或者不具备宣教的能力是很少见的。双职或三职的牧师、宣教士、神学家是常见的情况，不是不常见的。但除了普世的大会之外，他们往往没有统一的力量。

非洲的圣经注释

2006年，出版了一部突破性的著作——《非洲圣经注释》³，七十位非洲学者（可能受《七十士译本》的启发？），从单纯的非洲角度，注释了圣经的每一卷书。独特之处不仅有文化因素，而且也有种族因素——每一个作者都是非洲黑人（甚至没有任何的南非白人），并且几乎都拥有圣经神学的博士学位。这部注释出自一个会议，但根源却早在1994年，肯尼亚内罗毕举行的“第二届泛非洲基督教领袖大会”（PACLA II）。当时，他们就认识到非洲教会存在着许多基础性的弱点，诸如圣经知识不足、错误运用教义。他们认识到，非洲教会在数量上有一英里长，但在质量上却只有一英寸。⁴为应对这一需求，成立了非洲福音协会（AEA）。但是，把这个梦想变成现实，它采用了一个宣教的体制——服侍宣教（SIM）。非洲福音协会有思想和异象，服侍宣教有基础设

施支持，因此就产生了《非洲圣经注释》（ABC）。2001年推出这部著作，但花了五年的时间，才最后完成。

土昆布（Tokunboh Adeyemo，尼日利亚人）是总编辑；恩奎瓦（Samuel Ngewa，肯尼亚人）把握新约的英文；哈布图（Tewoldemedhin Habtu，厄立特里亚人）承担旧约的英文；库利巴利（Issiaka Coulibaly，科特迪瓦人）负责一切法文的词目。《非洲圣经注释》由肯尼亚活泼之道（Word Alive）出版社出版，并且桑德凡出版社（Zondervan）也成为西方出版社向非洲发行出版物的合作伙伴。

这部注释，不仅仅关乎圣经的每卷书，而且还关乎到非洲的语境。毕竟，很多的圣经事件都发生在非洲（埃及、埃塞俄比亚，等地），所以，非洲文化在很多方面，实际上比西方文化更接近（字面的和比喻的）圣经文化；许多教父（奥古斯丁、特土良、俄利根，等等）也是非洲人。

南亚的圣经注释

2015年，接续《非洲圣经注释》，又出版了《南亚圣经注释》⁵（SABC）。这不是最初的本土计划，乃是受《非洲圣经注释》的启发。2005年，十四名朗廷学者聚集在印度，组建了南亚朗廷地区合作委员会（LPRC-SA），可能不是一个普世大会议，乃是属灵的会议。朗廷是斯托得（John Stott）事工部的名字，他们长期为第四个“自”（自建神学）提供奖学金。朗廷奖学金每年都颁发给来自第二、第三世界的神学家，为他们在（国际可信的）西方大学取得博士学位⁶，提供全额奖学金；但是，规定他们毕业后，必须返回他们的家乡（为了充实主流教会，避免“人才外流”）。在2005年的会议中，朗廷文学计划总监彭定璋（Pieter Kwant），向南亚神学家提到非洲的圣经注释时说，亚洲人要有一个“圣洁的嫉妒”时刻，因为非洲人已经做出了一卷圣经注释，但亚洲人还没有！⁷这就引发了一个甚至超过非洲圣经注释的项目。尽管《南亚圣经注释》的范围仅仅扩展到印度、斯里兰卡、尼泊尔、孟加拉国、巴基斯坦、不丹和马尔代夫，但这个地理区域比非洲小得多（人口密度）；实际上，印度是南亚次大陆，就意味着像非洲一样人口众多，文化多样。

《南亚圣经注释》全书1807页，比《非洲圣经注释》（1612页）更长，并使用了更多的参与者（92个，而不是70个），以及更多的编辑：温特尔（Brian Wintle）是总编辑，旧约是由哈腓拉（Havilah Dharamraj）、帕斯卡尔（Jesudason Baskar Jeyaraj）、斯沃尔（Paul Swarup）编辑；新约是雅各布布（Jacob Cherian）、腓利（Finny Philip）

编辑。虽然所有的作者都是南亚土生土长的（与非洲圣经注释平行），但较少在圣经神学中拥有博士学位。尽管他们在亚洲的主要出版商是印度的开放出版社（Open Door Publications），但他们也与桑德凡出版社合作，作为他们在西方的出版部门。虽然南亚有很多种语言，但实际上英语是通用语言，所以《南亚圣经注释》需要以英语的表达出版。

毫不奇怪的，《南亚圣经注释》的内容，关注了宗教竞争的互动。南亚可能是世上最多元化的多样性宗教环境，其中混合着基督教、伊斯兰教、印度教、佛教、耆那教、锡克教、巴哈教，以及犹太教。

拉美的圣经注释

到目前为止，在全球神学注释丛书中，我们只有两部注释书。不过，第三部圣经注释书，将很快会从拉美的角度出版。实际上，这部注释书不叫做《拉美圣经注释》（CBL），因为这个名称已经被使用了，并且指的是目前罗马天主教的出版物。所以，即将出版的注释书叫做《当代圣经注释》（CBC），以免混淆⁸。总编辑是帕迪拉（C. René Padilla，阿根廷人），旧约编辑是米尔顿（Milton Acosta，哥伦比亚人），新约编辑是罗莎莉（Rosalee Velloso Ewell，巴西人）。

《当代圣经注释》的内容已经完成，不过还处在最后的编辑阶段。它与另外两部注释书在重要的方面迥然不同：

●这部注释的开始并没有西方的根源，无论是服侍宣教（SIM），还是朗廷或任何其它机构都没有参与。它是 100%的拉美起源和作品。它出自尝试同时做一样事的三个源头：巴西、西班牙国际学生福音团契（IFES）和阿根廷的凯罗斯。他们不是试图彼此独立发明方向，而是融合且决定合作。他们都同意的一件事就是，这必须是拉美的首创。朗廷在后期确实提供了一些资金，但所有权和异象仍然属于拉美。

●这部注释书的主要语言不是英语，而是以两种语言出版：西班牙语和葡萄牙语。桑德凡出版社最终会把它翻译成英文，并将它在拉美以外发布（由于《拉美圣经注释》一名尚未在英语世界被使用，所以称之《拉美圣经注释》）⁹，但是原始的拉美版本是尤尼达（讲西班牙语世界，西班牙国际学生福音团契的出版部门）与凯罗斯（帕迪拉在阿根廷的基金会）联合出版。

●大多数作者没有博士学位。与非洲不同，非洲有很多福音派的神学院和基础设施；由于天主教的统治地位，拉美的识字率并不高。天主教与非天主教（五旬节派，福音派，

主流新教)在拉美的分界线是非常显著的,所以策划的举动不包括任何的天主教作者,否则,许多非天主教人士就会完全拒绝。但是,也不可以任何方式贬低天主教,以免造成一些冲突。同样,在拉美的福音派中,需要的是实践者,而不是神学家,所以并没有出现发展“纯粹”的学者。

●缺乏合格作者,就意味着没有考虑到种族的资格,特别是由于拉美还是种族非常混合的(地区)。允许侨民成为《当代圣经注释》(CBC)的特约作者,只要他们大部分时间在拉美度过即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尽管非常困难找到具有适当学术证书的拉美福音派人士,但最终的记录却包括约160位作者,参与了这部注释。

我期待看到《当代圣经注释》具有的神学重点。我猜测,这个“整体使命”将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为这实际上是“拉美神学团契”的最初主题。

除了非洲、南亚、拉美的注释之外,将来还计划出版阿拉伯世界¹⁰和斯拉夫世界(特别是俄罗斯)的注释。西方世界是否有足够的兴趣,把这些著作译成英文,这有待观察。

东亚的圣经注释

非常奇怪的是,东亚并没有计划着写圣经注释。对于教会迅速增长的地区,诸如韩国和中国大陆,这似乎是一个明显的疏忽。¹¹如前面所述,尽管“三自”一词被中国官方教会占用(就像“十字记号”在纳粹占用之前,它是印度教或佛教的祝福象征),但“三自”是起源于一个世纪前英国海外传道会的亨利·范恩。儒家的正名思想¹²可以在此运行,把这个名字恢复到起初的意思,与很多福音派希望做的事情相同;因为政治和媒体歪曲篡夺了“福音派”¹³一词的原本意思。

在为东亚酝酿自建神学(第四个“自”)的圣经注释时,以下是我所盼望和所期待的。当然,我只是提出一些个人的观点,所以,在东亚圣经注释中,我很想听到我的论文回应者他们想看到的内容。我把这一块分为三个部分:地区,作者和内容。

1.关于地区。我很高兴《南亚圣经注释》为南亚提供一本圣经注释的先例。我最不能忍受的事情之一,就是把所有亚洲人合在一起。亚洲是世界面积最大的陆地,具有如此多不同的文化和地区,大致分为东亚、东南亚、南亚、中亚和西亚(西亚通常被我们称为“中东”,但是从北大西洋的角度来看,我更喜欢称之为“西亚”)。甚至亚洲两个人口最多的国家——中国和印度,尽管是地理邻居,但也存在很多的差异;也就是说因为这两国之间有一道自然的“长城”——喜马拉雅山(世界最高山脉),自从人类开始以来,就是他们之间不可逾越的障碍。

东亚，就像南亚一样，值得拥有自己的圣经注释。¹⁴ 不过，甚至东亚也是不统一的。如果我们认为东亚三个主要国家是日本、（南北）韩国和中国（我不是出于政治原因，而是出于文化原因，中国包括了港澳台），即使这样，甚至只讨论这三个国家，也会出现一些困难。这三个国家都是儒家思想，但中国大陆却外加了共产主义的影响（与北韩一样），这种共产主义“粉碎”了儒家的等级制度，消除了儒家的尊位。但是，把这些国家合在一起也是很有道理的。首先，由于实际的原因，也就是我们无法拥有世界各国的注释，否则我们会有大约 200 部的注释。就像使徒约翰说的，世界也容不下所写的书！所以，地区注释更有意义。其次，尽管东亚各国之间存在着显著差异，但我们不必在个别国家的注释中来看文化的多样性，只要谨慎注意参与者的人员，就可以藉着个别作者着写。第三，东亚有一个普遍的世界观，即儒家思想；儒家思想可以把这些国家连结在一起，所以拥有《东亚圣经注释》（EABC）并不是武断的。

尽管如此，还有语言上的困难：中国使用象形字，韩国大部分使用字母，日本使用两种不同的音标（平假名和片假名）并附加中国汉字；所以存在一个问题，到底该使用哪一个写作体系呢。我想说的是，因为日本的基督徒人数太少¹⁵，所以假设，未来《东亚圣经注释》应该被翻译成中文和韩文（类似于拉美圣经注释被翻译成西班牙语和葡萄牙语）。毕竟注释的目的是为了促进现有的基督教神学，而不是传福音给非基督徒（当然，最终希望桑德凡出版社把东亚圣经注释翻译成英文）；并且，尺度也会出现一个问题。与韩国相比，中国是巨大的，所以会有一个不平衡。与拉美不同，尽管巴西是拉美讲西班牙语最大的国家，但巴西并不占主导地位，因为还有很多其它国家是讲西班牙语的。但东亚绝大多数是华人。甚至全球教会也需要华人。洛桑第三届会议（2010 年，开普敦）召开时，没有出现华人，与洛桑的格言主旨（整个教会要把整个福音带向整个世界）相距甚远。总之，中国正是世界的一股主导力量。例如，《普世宣教》的祷告指引覆盖了全球，但中国大陆单独提出一个祷告指引，称之为《中国普世宣教》，其中详细说明了每一个少数民族的群体。所以，华人也有应该有自己的圣经注释。不过，所有其它圣经注释都是地区性的，并不是特定国家的；所以东亚的圣经注释更有意义（华人还包括了更多移居在台湾、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地的中国人）。

2. 关于作者。值得注意的是，把当今世界上最伟大的神学家列入名单时，其中几乎没有任何的东亚人。常常会提到一些拉丁裔神学家，诸如帕迪拉（René Padilla），或古斯塔沃（Gustavo Gutiérrez）；也有一些众所周知的非洲神学家，诸如博迪卡（Bediako）

或桑纳 (Lamin Sanneh)；还有一些著名的南亚神学家，诸如费南度 (Ajith Fernando) 和雷马强佐 (Vinoth Ramachandra)。当然，常常有大量的欧洲和北美的神学家，甚至代表性人物会更多。但东亚地区的神学家代表却是少之又少。根据东亚巨大的基督徒人数，怎么会是这样呢？

一个主要的问题是语言。如今英语是世界的通用语，这是自身延续的（即，“富有”会继续变得更富有）。因为非洲和南亚都有一长段的殖民历史，讽刺的是，英语最终成为统一他们不同国家的商业语言；不过，这也使得他们的圣经注释很容易进入世界（这不是没有圣经的先例，新约就是用共通语希腊语写的，而不是用圣洁的犹太希伯来语，因为希腊语是那时代的通用语，对尽可能传播给更多人就很重要）。东亚则不是这样，不像非洲或南亚地区是英语占主宰地位。2010 年的开普敦会议，讲台上几乎没有中国大陆或韩国的讲员，这最初似乎令人费解。但这可能是语言问题：讲台上所有东亚讲员都来自讲英语的地区，诸如香港、新加坡和马来西亚（非洲的讲员也一样，几乎都来自英语地区，而不是讲法语的非洲国家）¹⁶。大学也是一样。根据三大排名系统，世界排名前二十名的大学（评级标准：上海交通网，时代杂志，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都是讲英语的。无论北京大学，还是首尔大学，还是东京大学从事的教学或科研如何强大，都不能吸引非亚洲语言的讲员，除非那些讲员以某种方式学过中文或韩文或日文，学习这些语言是非常具有挑战性的。反之，大量的东亚人却会进入西方讲英语的大学学习。所以，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非西方人的多语言技能意味着他们总是适应西方，西方从来却没有适应他们，因为他们正好假设了每个人都能学会英语。当然，西方有一些东亚血统的神学家是值得注意的，但《东亚圣经注释》的目标就是只使用拥有圣经神学博士学位的本土东亚人来写出。找到 70-90 名这样的学者成为一种相当令人生畏的重任。或者也许不会，因为东亚人非常重视教育。不过，华人与韩国人的情况有所不同：韩国兴起的大教会，意味着作一名主任牧师就是更多的名望，和更多的敛财之道，而不是成为一名学者。所以，韩国很多聪明人士实际上并没有博士学位，因为他们花时间和精力牧养大型会众，而不是着写神学；也许他们的讲章比他们的书籍，更是良好的神学矿藏来源。

实际上，已经有大量的优秀神学著作和圣经注释是用中文和韩文写的，所以，自建神学不是问题。中国有一家奇异恩典出版社 (Amazing Grace Publishers) 完成了一系列大量的 43 卷圣经注释¹⁷。韩国也有一些全本的圣经注释¹⁸。在世界其它的地方，这些作者并没有被人熟知的名字，但他们做着大量的自建神学。当然，《东亚圣经注释》(EABC)

必须是一整套的圣经注释，所以，已完成的注释系列，并不否定把《东亚圣经注释》做成“顺手易得工具书”的必要性。如同《拉美圣经注释》一样，将用两种最初语言（西班牙语和葡萄牙语）出版，但随后被翻译成英语，用于世界其它的地方；一个潜在的可能，《东亚圣经注释》先出版两种不同的语言版本（中文和韩文），但随后也需要翻译成英语，用于全球。

要顺利完成圣经注释，不仅需要拥有博士学位的人，和一批有动力开始这样努力的国民（如果动机来自外部，就不会是真正的自建神学）；还需要安排印刷过程的资金。关于资金，中国现在已经成为世界的经济强国。就这一点来说，位于南京的爱德出版社（Amity Publishing）是世界上最大的圣经出版社。像安德鲁兄弟（Brother Andrew）把圣经偷运到中国的日子，已经一去不返了。国外的桑德凡（由保守这些各种各样系列连续性的朗廷合作伙伴，皮耶特所启发），为全球读者出版了第二、第三世界的神学，就真正实现了“辅导者时代”（Facilitator Era）的简化定义¹⁹。

最后，一个好的编辑也是十分重要的，编辑可以把那些作者的内容统一起来，保持神学的一致性。编辑评定那些作者，必须铭记神学和教派及国际的多样性。编辑必须确保不可把次要的神学观点放在重要的位置，并且确保作者之间的神学没有冲突。华人教会正在做一件善工，尝试把他们的“三源”（灵性、悟性和品性）合在一起。这种普世的合作也是需要的。

3. 关于内容。有一些宗教上的思考：因为佛教是世界最广泛的宗教信仰，所以佛教应该是写给东亚读者的主要文化背景棱镜吗？或许儒家思想是一个更安全的文化背景棱镜，因为儒家思想是一套哲学，而不是一个对抗的宗教。无论哪种方式，都取决于一个人使用理查德森（Don Richardson）救赎类比原则的程度²⁰。一个人可以像使徒保罗在亚略巴古（徒 17 章），把雅典人“未识之神”看作是指向耶稣吗？如同首次传教给中国的景教徒那样做的，可以通过道教的语言传播福音吗？²¹我们可以像耶稣会利玛窦那样处境化，穿着像儒家学者，用那种语言和礼仪在中国礼仪之争中解释基督教吗？或者像新教传教士理雅各布（James Legge）那样彻底本土化，他登上北京天坛的阶梯时，向中国神庙中的主神“上帝”颂赞呢？

处理三自政府教会与家庭教会之间的争执，也可能是一个内容上的粘性问题：三自教会的掌权人士可以在多大程度上接受这种颠倒的国度观念呢？（比如，马利亚的尊主颂，神“叫有权柄的失位，叫卑贱的升高”）。这种“解放神学”的观点，似乎家庭教

会认为与拉美基础教会团体（BECs）相类似（受压迫者经常写出伟大的神学著作，就像新教改教家在天主教的压迫之下，所证明的那样）。或者共产党员实际上也会喜欢彻底本土化的耶稣教训，就像意大利社会主义电影导演帕索里尼（Pier Paolo Pasolini），他根据一字不差的耶稣生活，制成一部著名电影《马太福音》，后来被他所制电影的景象吸引²²。或许中国三自教会与家庭教会，也可以在彻底本土化的耶稣教训中找到共同点；或许南韩与北韩也可以找到同样的共享共鸣。不过，华人与韩国人的文化及神学之间也有一些重大的差异，比如，华人倾向于平等，韩国人倾向于互补。

当然，仍有机会表达本土神学，诸如民众神学或水牛神学²³。不过，对人们来说，似乎这一类的神学更是新奇的，而不是可行的；甚至本国的基督徒也是疑惑地看待这些神学。拉美有一句谚语说，“解放神学选择了穷人，但穷人选择了五旬节派”。在韩国，似乎是解放神学选择了民众神学，但民众也选择了五旬节派（或者成功福音），特别是韩国已经越来越富有的时候。

我的朋友陈敏春（Sungmin Chun），是温哥华福音派世界观学院的系主任，温哥华福音派世界观学院是位于不列颠哥伦比亚兰利的一所韩国人神学院，也是加拿大联合神学院（ACTS）的联盟成员，在他的谈话中²⁴，他提出了一些观察：

① 韩国的自建神学，应当继承使徒信经与尼西亚信经所概述的信仰要点吗？如果是这样，岂不就是西方神学的重复，而不是真正的韩国神学吗？然而，如果韩国人远离了尼西亚信经的“要点”，那么，诸如推行民众神学或整合韩国民间宗教，这是基督教还是混合主义？

② 总之，韩国神学是什么？难道这就是韩国人做成的一些神学吗？

③ 考虑到东亚神学已经深受西方的影响了。所以，现代东亚并不需要太多的本土语境。现代韩国人不会对儒家或佛教的观念产生共鸣，所以，对现代韩国人来说，把那些作为语境接触点似乎过时了。不过，我要补充说，也许这是兼备的，而不是二选一的。在2010年的爱丁堡会议上，斯里兰卡的国际学生福音团契（IFES）雷马强佐说，“中国和印度每年一起输送的科学及工程毕业生比北美和欧洲的总和还多。但亚洲的宣教研究论文和宣教研究杂志的大部分文章，都专注于宗教派别和教派、传统部落文化或异国新宗教运动的历史研究”²⁵。西方人受到了东方观念的影响，诸如像耶稣那样的问答教学，或者出自印度的多元主义。²⁶如今东方人通常有一种西方式的教学，弗莱雷（Paolo

Freire) 称之为“银行”(banking) 模式, 就是老师讲课, 学生只是“下载”信息而已。²⁷ 在我们全球化的世界中, 东西方之间的界线变得越来越模糊不清。

④ 如果“异端是神学之母”(例如, 基督教大会就是回应异端, 迫使教会清楚表达正统的神学), 那么也许韩国神学就是回应今天韩国的任何异端。比如说, 我们对成功福音的回应是什么? 大型教会在建项目, 其中会有许多腐败吗? 大型教会主任牧师的世袭, 这变成了朝代, 却不是寻找最有资格的带领者吗?²⁸

这也可能是对实践此类事件的美国机构的一种预言, 就像葛福临(Franklin Graham) 继承了他的父亲葛培理(Billy Graham), 或者罗伯特(Robert Schuler) 的儿子接管了水晶大教堂。韩国人指出, 这些美国模式使他们自己的继承也合法化。或许韩国教会需要他们自身的改革, 那会是什么样子呢?

然而, 我看到最大潜力的地方就在于它的宣教神学里。照着字面意思, “亚洲”就是离开耶路撒冷的“地极”; 中国人一直渴望通过中亚把福音“传回耶路撒冷”²⁹。但是, 这必需与伊斯兰教相遇。艾克曼(David Aikman) 说, 穆斯林更喜欢中国人, 而不是美国人。一位中国基督徒直言不讳地说, 他们非常不喜欢美国人。艾克曼概括了中国基督徒在西方人失败的地方能够成功的几个原因。一个主要优势是, 中国政府支持中东一些反对美国的政治团体的目标, 所以穆斯林国家也支持中国。艾克曼又说, 此外, 我们还有许多迫害的经历。³⁰ 要明白《使徒行传》1 章 8 节也有一个大的逆转, 就是从地极, 到撒玛利亚, 到犹太全地, 直到耶路撒冷; 这也许是亚洲教会时代来临并继承先辈衣钵的一个大迹象。

结论

《东亚圣经注释》尚未启动, 但我想它绝不会永远不出现。这一章是一种激起“圣洁嫉妒”的呼呼! 不过, 这需要东亚神学专家的本土运动才能开始, 大部分神学专家必须拥有圣经神学的博士学位, 并且必须是福音派人士。博士学位是质量把关的必要条件, 以防未成熟的指控(虽然教会是年轻的, 但肯定能在其中找到 70 人有资格着写; 比如, 一亿的中国基督徒!)。福音派是使神学一致的标识, 因为这是一个跨教派却受感信赖的标贴。要在系列中与其它版本保持一致, 就可能会有朗廷的背景, 也可能被翻译成英语, 在西方世界由桑德凡发行。由于东亚的基督徒人数众多, 所以东亚非常急需资源; 一卷紧凑的注释, 足以让平民容易接触。的确, 亚洲有可以服侍本地人的神学院, 但鉴于大量的东亚人到西方接受神学教育, 或许这是一个还不足够的迹象。而且, 在西方获

得教育的这些人，不一定需要他们正好在他们家乡的环境中侍奉；所以《东亚圣经注释》（EABC）还是需要的。

除了信条和注释之外，还有许多其它形式的自建神学，那就是神学书籍。我期待有一天，照着赖德烈（Kenneth Scott Latourette）《基督教的扩展历史》或卡尔亨利（Carl F.H. Henry）《神，启示和权威》的规模，东亚神学家也能写出一部多重的巨著著作。

最后，如果写出一部《东亚圣经注释》，那么为了全世界，也必须翻译成英语。即使东亚已经出现了许多方面的自建神学化，但问题在于它几乎没有遍及全球。西方需要向非西方世界学习；同样地方式，四卷福音书是从四个不同的文化角度写成的。例如，《马太福音》是犹太人的福音；《路加福音》是外邦人的福音；但这并不意味着，犹太人不可去读《路加福音》或外邦人不可去读《马太福音》。我们从不同的文化角度认识神时，我们就会更加丰富。但这几卷福音书都是用那时代的大众通用语（希腊共通语，相当于今天的英语）写成的，便于大众传播。

当问及西方基督徒，非基督徒是否应该接受尼西亚信经时，即使我解释说，尼西亚信经是对西方神学争竞的一种回应，通常的回答也是“是的”。但是我反问，那么西方基督徒需要接受非基督徒所写的信条吗？他们就犹豫不言。我认为它需要二者兼备。例如，西方可以教导主流世界的基督论，但主流世界也可以教导西方更多的圣灵论。如果西方人抗议说，他们怀疑非西方人的圣灵论，因为这往往会转向像“健康与财富”那样的异端；我就会说，不要把婴儿和洗澡水一起倒掉。可以做的是：主流世界的神学家需要聚集一起，并召开普世大会，批判异端关于圣灵的教导，编写正确的正统教训，并与西方世界分享之，以便西方基督徒也可以学习。即使一个特有的文化从来没有在其背景下讨论过一个特有的神学问题，这也有助于从其它有过此类争战的文化中学习这种争战，就像是一种对付未来异端的“疫苗”³¹，因此他们就不需要白费力气做重复工作。所以，这就是《非洲圣经注释》、《南亚圣经注释》、《拉美圣经注释》，以及设想的《东亚圣经注释》，不仅服侍其文化背景之下的人，也为全球教会预备了一种良好的神学。

索引

1. 《运用福音》，华伦编辑（大溪城，曼斯出版社，1971年）。
2. 《人类学回应宣教问题》，希伯特着（大溪城，贝克出版社，1994年）97页。

-
3. 《非洲圣经注释》，土昆布编辑（大溪城，桑德凡出版社，2010年），与肯尼亚活泼之道出版社合作出版。
 4. 同上。
 5. 《南亚圣经注释》，温特尔编辑（大溪城，桑德凡出版社，2015年），与印度开放出版社合作出版。
 6. 关于这个话题，有很多要说的。我意识到有一个缺陷就是，即使所有本土作者着写圣经注释，但大多数人在西方获得了博士学位，所以他们的思维方式可能比不上本土人士。但我并不担心，因为对人们来说，博士学位是对知识做出原创性贡献（这基本上就是自建神学！），而不是下载信息。我更关心的是在西方取得道学硕士的非西方牧师。不过，就像朗廷奖学金一样，那些在西方取得博士学位的国民（为了建立他们的名气、声望、威信），需要返回他们的家乡，并在那里建立神学院；盼望多年之后，那些神学院可以享有声望，并依靠声望可以维持下去，然后，国民不再需要去西方（读神学）。
 7. 同上。
 8. 这部分信息是由哥斯达黎加，莱特拉维瓦的达克（Ian Darke）慷慨提供。
 9. 尽管西班牙语和葡萄牙语版的注释很快就会出版，但英语版仍需几年后才会出现，因为它需要翻译。
 10. 阿拉伯语的注释很有意思，因为一些作者对震荡早期教会的原始神学争辩仍持有不同意见；例如，和子说和圣像，以及基督两性的关系。这是有道理的，因为这些就是来自世界此地区的原本争辩。
 11. 事实上，这也适用于亚洲所有的“四小龙”：韩国，台湾，香港，新加坡；印度尼西亚等传统穆斯林地区也是如此。参阅，2010年纪录片——“1040：新亚洲基督教”的视频证据。
 12. 感谢徐志秋提及这一点。
 13. 苏格兰斯特灵大学，圣经学者、评论家、改变者、活动家（所谓的“四角宾顿”）巴宾顿（David Bebbington）阐述了它的原始历史意思。
 14. 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非洲的一切是否不应该集中在一起（应该在撒哈拉沙漠与撒哈拉以南分割开）。

-
15. 即使是这样，还需要决定是使用简体中文（中国大陆和新加坡使用），还是使用繁体中文（其它地区使用，诸如台湾，香港，海外华侨，等等）
 16. 《多中心宣教学》：从个人到地方的 21 世纪宣教，叶艾伦 着（丹尼森，IVP 学术出版社，2016 年），134 页
 17. 感谢香港的钟国强（Derek Chung）提供了这个信息。
 18. 感谢温哥华福音派世界观学院系主任陈敏春（Sungmin Chun）提供了这个信息。
 19. 拉尔夫·温特（Ralph Winter）说，从1800年至2000年，西方新教宣教有三个时期：
 - ①1800年至1910年（非洲和亚洲的沿海地区），其中廉克理（William Carey）是主要的推动者；
 - ②1865年至1980年（渗透内陆），其中戴德生是主要人物；
 - ③1935年至今（未得之民的开拓宣教），其中卡麦隆（Cameron Townsend）是一个卓越的榜样。但根据史蒂芬（Tom Steffen）的书，《辅导者时代》——超越开拓教会倍增（Eugene, OR: Wipf & Stock, 2011年），从20世纪晚期开始，我们现在就是“辅导者时代”。宣教由诸如华理克（Rick Warren）那样的人带领，从接触到接触。与前三个时代不同，那三个时代都是长期的宣教开拓工作；辅导者时代则是一种合作伙伴，时常通过短期的宣教。
 20. 就像理查德森在他的书《平安儿女，永恒在他们心中》中所解释的。
 21. 《耶稣的经典：重新发现基督教丢失的道教卷轴》，彭马田（Martin Palmer）着（纽约，百龄坛出版社，2001 年）
 22. 电影《马太福音》（1964 年）
 23. 《水牛神学》，小山晃佑着（玛利诺外方传教会，奥比斯出版，1999 年）
 24. 我们同时在牛津大学攻读博士时，我在那时就认识了他（陈敏春）。
 25. 雷马强佐“回应”金柯尔（Kirsteen Kim）与安德森（Andrew Anderson）所编辑的《今天和明天的宣教》（牛津，列格努姆出版，2011），334-336 页。
 26. 在《多元化社会的福音》（大溪城，德曼斯出版社，1989 年）中，印度的英国宣教士纽毕真（Lesslie Newbigin）断定说，欧洲是最难宣教的禾场，因为欧洲已经变得越来越多元化。
 27. 《受压迫的教育》弗莱雷着（纽约，连续出版社，1999 年）

28. 上周（2017年5月10日），弹劾韩国首位女总统朴槿惠，就是世俗环境中的一个恰当例子。她能当选，主要是因为她父亲曾担任过国家元首，但她显然不能胜任总统的工作；由于腐败和滥用权力，她被解除职务了。

29. 刘振营（云弟兄），徐永泽（Peter XuYongze），王以诺（Enoch Wang）

《回归耶路撒冷》：三个中国家庭教会领袖分享他们完成大使命的异象

杨天民（Paul Hattaway）着（凯恩斯，真实出版社，2003年）

30. 《耶稣在北京》：基督教如何改变中国，以及改变全球的权力平衡

艾克曼着（华盛顿特区，勒涅里出版社，2003）12-13页

问答交流

王志勇弟兄：感谢叶博士从全球化、本色化的角度来给我们分享如何做神学，特别是东亚的神学。我简单地有三个反馈。靠着主的恩典，我做本土化神学差不多快二十年了。第一个阶段是翻译性的阶段，我自己翻译了差不多五百多万字的文本；第二个阶段我们也做直接的创作，我差不多也写了七到八本书。我想对叶博士的谈论，提出三方面的问题：第一个方面，刚才叶博士讲到，世界基督教的第一个中心是非洲，第二个中心是中国，其实我不是很赞成，为什么？因为我是在中国出生，也在中国牧会七年，每年都去中国传教，中国教会连基本的聚会自由都没有，我们能够成为世界基督教的中心呢？所以崔权牧师，很资深的牧师，他自己都承认，现在的神学建造方面还要向西方学习，包括南韩的神学，很多有影响的，都是在美国做的；而且叶博士也提出一个标准，就是，教会在神学方面能够自我思维，就是教会比较成熟的标志。大陆很多牧者基本上就是求存的状态，没有独立的全方位的神学。第二个方面讲到黑人的神学，讲到一定要博士才

能写注释，而且白人不能写，为什么用白人的英文写呢？为什么不用黑人的语言，那才是他们真正的本土化神学。你讲到《东亚圣经注释》的时候，我深知，我确信，在中国大陆，特别是香港和台湾，有很多很好的中国本土人所写的神学注释，像我读到陈终道先生的注释，贾玉铭先生的注释，香港天道书楼出版的整个本土化注释，都非常好；但是，我们好像也没有必要，也难有精力把这些书籍翻译成英文的。其实华人教会的神学家已经做出了非常大、非常精微、非常好的著作；好像他们写的水平，从学术和属灵的水平，丝毫不亚于一些西方或非洲人的专著。谢谢叶博士在神学本色化的思考方面，一方面感谢，一方面提出这几点来商榷。

叶艾伦弟兄：（徐志秋弟兄翻译）谢谢你的评论。我试着回答你的几点。第一是关于语言：用英语写出非洲和南亚的圣经注释，主要是基于现实的考虑。因为非洲有上百种语言，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不同的语言。为了有更多的读者，需要用一种大家都能够阅读的语言来写。这也是为什么新约圣经是用希腊文来写，而不是希伯来文。犹太人也会因此感到愤怒，为什么不用神圣的希伯来文来写呢？是因为希腊文是当时通行的语言。第二，你提到中国基督徒还处在挣扎生存的时期，没法写出好的注释。其实宗教改革时期，伟大的神学著作都是在被迫害的情况下出现的。我认为逼迫反而会催生出伟大的神学著作。第三，成熟度。你说中国的基督徒还没有成熟到可以写出自己的注释。非洲和南亚的基督徒都写出了自己的注释，难道中国的基督徒还不如他们吗？并不是说每一个中国的基督徒都需要成熟，但是至少有一些基督徒，是足够成熟可以写圣经注释的。这也是为什么注释的作者，必须拥有博士学位，乃是为了质量把关。中国有一亿的基督徒，难道还找不出七十个人来写这本圣经注释吗？当然可以找得到。

王志勇弟兄：我需要澄清一下，我刚才不是说中国教会和中国基督徒不够成熟，我是说中国教会和中国基督徒发展神学，时机还没有到。

李晖弟兄：问一个问题，非洲写圣经注释的七十个作者，是不是同一个背景？

叶艾伦弟兄：他们特别是从不同的国家中被选出来。

李晖弟兄：他们是不是同一个属灵的背景？

叶艾伦弟兄：（徐志秋弟兄翻译）他们都是福音派背景。这是非常重要的。对拉丁美洲来说是个大问题，因为大部分基督徒都是天主教的。他们要找出七十个福音派背景的作者，而不是天主教背景。因为天主教和新教有很大的分歧。如果出现一个天主教徒，那么写注释就永远都不会有任何进展。